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分期的再认识

——兼论营盘山遗址的分期、年代与文化属性

何锐宇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 本文重新梳理了东乡林家遗址的发掘报告, 获得了一些新线索, 对林家遗址的分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进一步讨论了茂县营盘山遗址的时代和文化属性, 认为营盘山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马家窑类型发展到岷江上游的一个地方类型。

关键词: 林家遗址; 营盘山遗址; 分期

中图分类号: K8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11)04-0029-11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位于大夏河东岸的黄土高原上, 西面塬下为东川河谷盆地, 遗址由秋粮地、阴洼坡和破寺角等平原、山坡、土岗连成一片。1977~1978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会同有关部门对林家遗址进行发掘, 发掘面积近 3000 平方米, 并整理发表了发掘报告, 将马家窑类型文化遗存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1] 原报告较为全面地公布了发掘材料, 为认识和进一步研究马家窑类型文化的内涵、性质以及其他有关问题提供了依据。但是, 报告对遗址发现的遗迹现象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房址, 而对灰坑、窑址的开口层位并没有交代清楚, 从而影响了林家遗址马家窑类型分期的细化和深入。后来也有学者在对林家遗址发掘报告分期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分期, 基本上维持了原报告的结果;^[2] 近来又有将其分为三期, 但第三期分为早晚两段。^[3] 无疑, 随着分期的深入, 对林家遗址马家窑文化的发展认识也进一步加深。近年, 川西北的茂县营盘山、^[4] 汶川姜维城^[5] 等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 均含一定的马家窑类型文化因素, 对于这些遗址的时代和文化性质尚有不同意见。基于此, 笔者重新梳理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 获得了一些原来未引起重视的线索。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对林家遗址的分期拟提出自己的看法, 并进一步讨论茂县营盘山遗址的时代和文化属性。

一、林家遗址的层位关系

首先, 从原报告介绍第 6 层为“夯筑硬土, 为下层半地穴房址内的堆积……且此层下为生土”, 我们可知第 6 层实际为下层房址 (F9、F19、F24、F26) 的垫土; 另外, “第 5 层叠压于下层房址之上, 包含物极少, 是屋顶或墙壁上铺抹的泥皮的堆积”, 可以理解为下层房址的废弃堆积。所以, 第 6 层, F9、F19、F24、F26 和第 5 层是代表下层房子的建造、使用和废弃三个不同阶段的堆积, 年代相差当不会太远, 从地层关系上可将其划为遗址的早期堆积。

其次, 由原报告“图二(上) T16-17-18 北壁地层剖面图”可知①→②→③→④→H5、H54→⑤→F9→⑥; 由“图二(下) T19-48 北壁地层剖面图”可知①→②→③→F8→④→H40→F26→⑥; 由原报告“图四 F17、F18 叠压关系剖面图”可得到另外一组地层关系, 即①→②→③→F17→④→F18、H31→⑤→F19→⑥。

再次, 从报告的叙述可知第 3 层以上没有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单位, 即第 3 层为新石器时代最

晚的地层单位。从报告叙述中我们还得到 6 组遗迹打破关系,此前已经有多位研究者曾注意到的,即 H54→F12, F18→H30, H40→F26, H69→H71, F22→H70, Y1→F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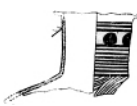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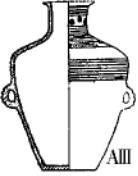


最后,还可以从原报告“图三 探方、遗迹平面分布图”得到多组比较确定的遗迹间的打破关系,结合前面已经确定了房址的开口层位,我们可间接得到一些灰坑的开口层位,悉数列举如下:③→H68→F27→F22→H70、H71;④→Y1、H31→F19→⑥;④→F7→H55、H88;③→F6→H2、H96、H97;④→H40→F26→⑥;③→H13→F5→④;H5→F12→⑤;④→F18→H30。

这样,我们就尽可能复原了一部分遗迹的开口或打破地层,可以分为 3 组。A 组,下层房址

和废弃堆积(第 6 层、F9、F19、F24、F26、第 5 层、H14、H71、H30、H70、H55、H88);B 组,中层房址、灰坑(F2、F4、F7、F12、F18、F22、Y1、H5、H31、H40、H54、H69)和第 4 层;C 组,又可分为 2 小组,其中第 3 层下各遗迹单位(F6、F8、F17、F27 等 21 座房址、H2、H96、H97、H13、H68)为 C1 组,第 3 层为 C2 组。

二、林家遗址陶器类型学分析

在理清林家遗址层位关系的基础上,我们依据器物的形态变化对典型器物重新进行类型学划分。林家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以罐、瓶、缸、盆、钵、甑、带嘴锅、碗为主,另外有少量瓮、豆、托盘和器盖等。

器类 分期	彩陶瓶		壶	缸	带嘴锅
早期					
中期					
晚期 早段					
晚期 晚段					

图一 彩陶瓶、壶、缸、碗、带嘴锅分期表

彩陶瓶: 1. A 型 (F19:1) 2. B I 式 (F21:5) 3. B II 式 (T14③) 壶: 4. I 式 (T35⑥:111) 5. II 式 (H9:2) 6. III 式 (F8:12) 缸: 7. I 式 (T35⑤) 8. II 式 (T53③) 带嘴锅: 9. I 式 (F19:26) 10. II 式 (F21:6) 11. III 式 (T52③)

彩陶瓶 依据口部特征,分为二型。

A 型: 直口,鼓肩,腹部无耳(图一: 1)。

B 型: 侈口,腹部有对称圆形小耳,分为 2 式。

I 式: 折沿,尖唇,颈部饰条带纹,肩部饰二方连续涡旋圆圈点纹(图一: 2)。

II 式: 平沿,尖唇,颈部饰条带纹和圆圈点纹,腹部饰平行线纹(图一: 3)。

壶 分为 2 式。

I 式: 侈口,尖唇,长颈,颈部饰条带纹(图一: 4)。

II 式: 侈口,平沿,圆唇,颈部较 I 式短

(图一: 5、6)。

缸 出土较少,分 2 式。

I 式: 尖圆唇,直腹,腹部饰捏塑的附加堆纹(图一: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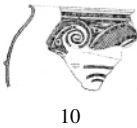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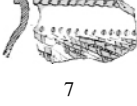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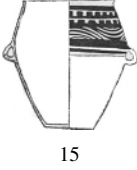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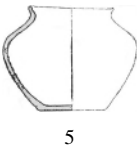







II 式: 方唇,下腹内收(图一: 8)。

带嘴锅 均为筒状流,分为 3 式。

I 式: 敛口,弧腹,口沿下饰弧线黑彩(图一: 9)。

II 式: 口部有压印齿状花边纹,弧腹,平流(图一: 10)。

III 式: 口部饰压印齿状花边纹,流斜行向上(图一: 11)。

器类 分期	A	B	C		D	E	
			a	b		a	b
早期							
中期							
晚期早段							
晚期晚段							

图二 陶罐分期表

1. AI 式 (T3⑥:66) 2. A II 式 (H55:34) 3. B I 式 (F24:6) 4. B II 式 (T18④:2) 5. B III 式 (F8:12) 6. Ca I 式 (F9)
 7. Ca II 式 (T4⑤) 8. Ca III 式 (F8) 9. Ca IV 式 (T13③) 10. Cb I 式 (F9:22) 11. Cb II 式 (H54) 12. D I 式 (T35⑤)
 13. D II 式 (T18④:37) 14. D III 式 (T20③) 15. Ea I 式 (F4:1) 16. Ea II (F16:7) 17. Eb 型 (F8:1) 18. Ec 型 (F21:9)

罐 依据口部和腹部特征,分为五型。

A 型: 敛口,弧腹,腹部有双系,依据腹部特征,分为 2 式。

I 式: 腹较鼓,腹部两侧有对称双系,肩部饰“四角星”纹和平行线纹(图二: 1)。

II 式: 颈部和腹部均有对称双系,腹部饰“三趾爪”纹和平行线纹(图二: 2)。

B 型: 侈口,鼓腹,分为 3 式。

I 式: 溜肩,口沿和腹部饰黑彩条带纹和变体鸟纹(图二: 3)。

II 式: 折肩,素面(图二: 4)。

III 式: 颈部较短,器型矮(图二: 5)。

C 型: 卷沿,依据陶质和口部特征,分为二个亚型。

Ca 型: 夹砂陶,腹部饰绳纹,分 4 式。

I 式: 沿微卷,方唇,颈部较长(图二: 6)。

II 式: 卷沿,方唇,花边口沿(图二: 7)。

III 式: 卷沿,短颈,花边口沿(图二: 8)。

IV 式: 卷沿,圆唇,肩部饰水波纹和附加堆纹(图二: 9)。

Cb 型: 泥质黄褐陶,通体饰黑彩,分为 2 式。

I 式: 侈口,肩部饰蛙纹(图二: 10)。

II 式: 敛口,溜肩,肩部饰平行线条纹(图二: 11)。

D 型: 敛口,分为 3 式。

I 式: 卷沿,短颈,颈部饰平行线条纹(图二: 12)。

II 式: 平折沿,尖唇,颈较长,颈部饰平行线条纹(图二: 13)。

III 式: 沿微卷,圆唇,颈部饰平行线条纹(图二: 14)。

E 型: 深腹罐,依据陶质和口部特征,分为三个亚型。

Ea 型: 泥质黄褐陶,腹部有对称双系,器物上半部分饰黑彩。

I 式: 敛口,溜肩,肩部饰“城垛”纹和平行线条纹(图二: 15)。

II 式: 侈口,折肩,肩腹部饰圆圈点纹和弧边三角纹(图二: 16)。

Eb 型: 敛口,平沿,圆唇,肩、腹各饰一道附加堆纹(图二: 17)。

Ec 型: 夹砂褐陶,侈口,折肩,周身饰绳纹和箍带纹(图二: 18)。

盆 依据口部、腹部形态差异,分为五型。

A 型: 折沿,弧腹,分 4 式。

I 式: 敛口,折沿,尖唇,弧腹略折(图三: 1)。

II 式: 口微敛,圆唇(图三: 2)。

III 式: 直口,折沿,腹较深(图三: 3)。

IV 式: 敞口,折沿,尖唇,浅腹(图三: 4)。

B 型: 平沿,短颈,分 2 式。

I 式: 直口,平沿,方唇,弧腹(图三: 5)。

II 式: 敛口,平沿,圆唇,弧腹(图三: 6)。

C 型: 敛口,弧腹,分 4 式。

I 式: 折沿,圆唇(图三: 7)。

II 式: 折沿,尖唇,弧腹略折,腹部饰草卉纹(图三: 8)。

III 式: 折沿,圆唇,腹部饰蛙纹(图三: 9)。

IV 式: 平沿,方唇,腹部饰草卉纹(图三: 10)。

D 型: 口微敛,折腹,分 4 式,器形变化不大,主要是彩绘纹饰的变化。

I 式: 折沿,尖唇,内沿饰“倒人形”纹(图三: 11)。

II 式: 折沿,尖唇,腹较深,腹部饰“三趾爪”纹(图三: 12)。

III 式: 窄沿,上部式连弧并列波浪纹间圆点纹(图三: 13)。

IV 式: 折沿,尖唇,腹部饰连弧并列波浪纹和“二趾爪”纹(图三: 14)。

E 型: 平沿,方唇,分 2 式。

I 式: 敞口,斜腹,腹下部饰交错绳纹(图三: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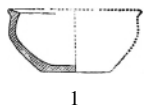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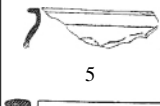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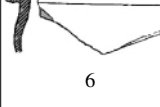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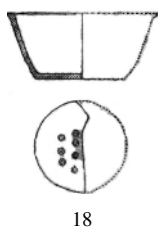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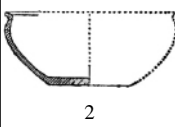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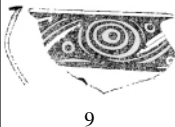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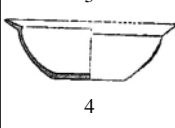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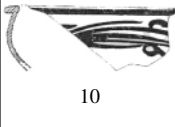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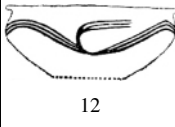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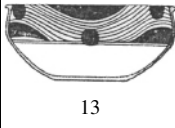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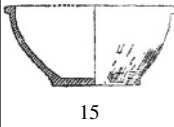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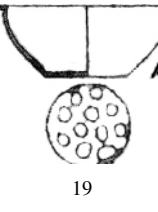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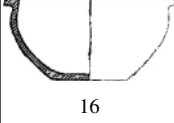
II 式: 直口,弧腹(图三: 16)。

甑 依据口部、腹部特征,分 3 式。

I 式: 口微敛,弧腹,腹部有双扳(图三: 17)。

II 式: 敞口,斜沿,尖唇,斜腹(图三: 18)。

III 式: 直口,平沿,方唇,弧腹(图三: 19)。

器 类 分 期	盆					甑
	A	B	C	D	E	
早期	 1	 5  6	 7  8	 11		 17  18
中期	 2		 9			
晚期早段	 3  4		 10	 12  13	 15	 19
晚期晚段				 14	 16	

图三 陶盆、甑分期表

盆: 1. A I 式 (T4⑥:66) 2. A II 式 (T23④:54) 3. A III a 式 (H92:31) 4. A III b 式 (F16:25) 5. B I 式 (T35⑥) 6. B II 式 (T4⑤) 7. C I 式 (T4⑥) 8. C II 式 (H70) 9. C IV 式 (T46④) 10. CV 式 (F16) 11. DI 式 (H55:29) 12. DII 式 (H27:7) 13、14. D III 式 (H23:24, T5③:8) 15. E I 式 (F21:10) 16. E II 式 (T24③:25) 甑: 17. I 式 (H81:18) 18. II 式 (H55:28) 19. III 式 (F8:13)

钵 依据口部、腹部特征分为三型。

A 型: 敛口, 分为二个亚型。

Aa 型: 腹较深, 分为 2 式。

I 式: 尖圆唇, 弧腹, 饰弧线垂帐纹 (图四: 1)。

II 式: 尖圆唇, 腹上部饰黑色彩绘垂帐纹, 腹部饰捏塑的附加堆纹 (图四: 2)。

Ab 型: 腹较浅, 分为 2 式。

I 式: 圆唇, 鼓腹, 饰平行带状纹黑彩 (图四: 3)。

II 式: 腹部饰柳叶纹和平行带状纹黑彩 (图四: 4)。

B 型: 直口, 弧腹, 分 2 式。

I 式: 直口微敛, 弧腹, 腹部饰草卉纹 (图四: 5)。

II 式: 弧腹略折, 腹下部饰两道平行条带黑彩 (图四: 6)。

C 型: 口微敛, 腹部有对称双扳, 分 2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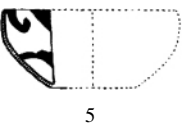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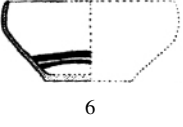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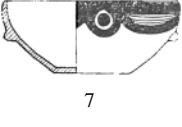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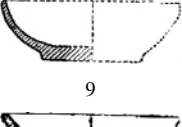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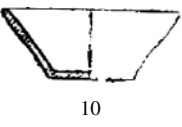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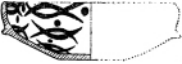
I 式: 上腹彩绘黑彩圆点和垂帐纹 (图四: 7)。

II 式: 器形较浅, 腹部饰弧线相交“鱼形纹” (图四: 8)。

碗 敞口, 分为 2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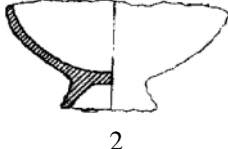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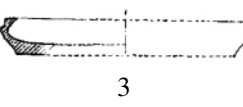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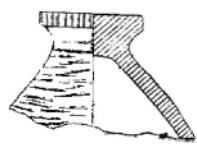
I 式: 尖圆唇, 弧腹, 假圈足 (图四: 9)。

II 式: 尖圆唇, 斜腹, 平底 (图四: 10)。

器 类		钵				碗
		Aa	Ab	B	C	
分 期	早 期	 1	 3	 5		
	中 期	 2		 6	 7	 9  10
晚 期	早 段		 4		 8	
	晚 段					

图四 陶钵、碗分期表

钵: 1. Aa I 式 (T4⑥) 2. Aa II 式 (T15④) 3. Ab I 式 (H81) 4. Ab II 式 (H46:62) 5. B I 式 (F9:54)
6. B II 式 (T46④:34) 7. C I 式 (T46④:35) 8. C II 式 (H92:27) 碗: 9. I 式 (H31:24) 10. II 式 (T4④:1)

瓮	豆	托盘	器盖
 1	 2	 3	 4

图五 其他类型器物

1. 瓮 (F6:2) 2. 豆 (F21) 3. 托盘 (T3⑥:61) 4. 器盖 (T4⑤)

瓮 仅 1 件。小口，圆肩，深腹，小平底 (图五: 1)。

豆 仅发现 1 件，口部残，弧腹，矮圈足 (图五: 2)。

托盘 敛口，方唇，折腹 (图五: 3)。

器盖 圆形扭，扭周饰绳纹，器盖呈倒喇叭型 (图五: 4)。

依据地层关系，结合上面陶器的类型学分析，我们可以将东乡林家遗址分为三期 4 段，分别为早期、中期、晚期早段和晚期晚段。

早期即 A 组地层单位。器物类型包括 A、B I 彩陶瓶，I 式壶，I 式缸，I 式带嘴锅，A I、

B I、Ca I、Ca II、Cb I、D I 式罐，A I、B I、B II、C I、C II、D I 盆，I、II 式甑，Aa I、Ab I、B I 式钵，托盘和器盖等。

中期即 B 组地层单位。器物种类有 B II、Ca II、D II、Ea I 罐，A II、C III 盆，Aa II、B II、C I 式钵和碗等。该段器物种类少，显得有些单薄，器物群中不见早期的托盘、器盖等器物，新出现的有 Ea I 式罐等。

晚期早段即 C1 组地层单位。器物种类有 B II 彩陶瓶，II 式壶，II 式带嘴锅，A II、B III、Ca III、Cb II、Ea II、Eb I、Eb II 罐，A III、A IV、C IV、D II、D III、E I 盆，III 式甑，Ab II、

C II 式钵, 另外有新出现的瓮、碗等。

晚期晚段, 即 C2 组地层单位, 该段出土器物种类少, 器物种类仅有 B III 式彩陶瓶, III 式壶, III 式带嘴锅, Ca III、Ca I V、D III、Eb I、Eb II 罐, D IV、E II 式盆, Ab II、C II 式钵等。

三、营盘山遗址的年代和文化属性

营盘山遗址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汶羌族自治县凤仪镇附近, 地处岷江东南岸二级台地上, 海拔约 1600 米, 高出岷江河面约 120 米, 遗址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2000 年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遗址进行多次发掘。发掘者依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陶器的组合和演变特征, 将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两期 4 段, 并建议将此类遗存命名为“营盘山文化”, 认为其是一种以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文化因素为主体成分, 同时吸收了多种外来文化因素的地方文化类型。^[6]试掘报告发表后, 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一种认为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存应归入马家窑文化, 岷江上游应属于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区;^[7]一种认为其是仰韶文化晚期类型, 并与甘肃白龙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可能是后者南迁的结果;^[8]还有一种认为相对仰韶晚期遗存来说, 营盘山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地位和大李家坪三期遗存相差不大。^[9]笔者认为, 要探讨营盘山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属性, 首先应该着力于遗址本身的分期和器物群的认识, 在分期的基础上判断遗存的上限和下限, 从而与周边文化进行比较, 进而探讨其文化属性。

(一) 分期与年代

试掘报告将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两期 4 段, 基本上反映了遗址的层位关系, 但是由于营盘山遗址地处坡地, 地层堆积并不连续, 笔者对遗址的分期和时代略有不同认识。在报告提供层位关系的基础上, 结合陶器的类型学分析, 我们认为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存可以分为 3 段 (图六)。

第 I 段, 即试掘报告的早期早段, 包括 H4、H12、H13、T8⑥、T12⑥等地层单位。第 I 段出土的器物较少, 可以分成两组陶器, A 组包括钵、彩陶瓶、壶等, 主要为马家窑类型文化因素; B 组主要为罐类, 为本土文化因素。

A 组陶器包括钵、彩陶瓶、壶 3 类。钵, 标本 T12⑥:71, 敛口, 弧腹, 腹部饰密集的斜向绳纹, 该种钵见于波西遗址 G1 (G1:6), 仅后者上腹另饰一周凹弦纹, 且腹部绳纹为纵向, 大李家坪第三期该类钵也多饰纵向绳纹。彩陶瓶数量少, 标本 H12:5, I 式, 侈口, 平折沿, 圆唇, 颈部饰平行线条纹, 肩部饰草卉纹, 腹部饰平行线条纹和水波纹, 该种草卉纹见于大李家坪第三期中段 (MT6⑦:59)。壶的标本不多, 标本 H12:2, A I 式, 直口, 平折沿, 尖圆唇, 高领外壁及沿面施陶衣并磨光, 该式壶见于大李家坪第三期中段 (MT2⑦:14) 和茂县波西遗址 (T1③:1); 标本 H4:19, B 型, 侈口, 尖圆唇, 领较短, 该式壶同样见于大李家坪第三期中段 (MH 21:78)。因此, 第 I 段的年代当于大李家坪遗址第三期中段的年代相当。

B 组陶器以罐类为主, 大致可以分为三型, A 型为直口罐, 标本 T12⑥:50, A I 式, 折沿, 圆唇, 束颈, 溜肩, 该器型沿用至第 II 段; B 型为侈口罐, 标本 H13:14, B I 式, 圆唇, 束颈, 唇面压印斜向绳纹, 颈部和腹部饰纵向绳纹, 最突出的特征是在肩部或腹部贴塑圆形泥饼; C 型为卷沿罐, 标本 H4:6, C I 式, 侈口, 卷沿, 方唇, 短颈, 唇面压印横向波浪式绳纹, 颈部饰纵向绳纹, 间部以下饰斜向绳纹, 该类罐也见于林家遗址和大李家坪第三期, 但林家遗址该类罐颈部一般不施纹样, 大李家坪第三期与营盘山的较近, 但仍有区别。

第 II 段, 包括 H3、H8、T12④、T10④等地层单位, 大致包括原报告的早期晚段和晚期早段, 这一阶段是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存中最发达的一阶段, 除了继承第 I 段的一些文化因素外, 在夹砂陶器出现了一些新的器形。

A 组陶器包括 II 式彩陶瓶、A II 式壶、彩陶罐、彩陶盆、带嘴锅、侈口罐、钵、碗和器盖等, 这些均是马家窑类型常见器型。标本 H8:4, II 式彩陶瓶, 广肩, 表面用黑彩绘制多组以弧边三角纹为主、呈带状分布的几何形图案, 与甘肃康乐县苏家地发现的基本一致。标本 H8:67, A II 式高领罐, 侈口, 卷沿, 圆唇, 颈部较 I 式短。标本 H8:1, 敛口, 平折沿, 方唇, 束颈,

颈部饰平行线纹, 肩部饰草卉纹、弧线圆圈纹和圆点纹, 腹部饰变体鸟纹、平行线纹和圆点纹, 其中草卉纹与营盘山 H12:5 彩陶瓶的相同, 变体鸟纹同林家遗址晚期遗存 (F21:5) 的完全一致。标本 H8:2, 彩陶盆, 敛口, 折沿, 尖圆唇, 上腹外壁饰水波纹和线条纹黑彩, 底部、内壁饰草叶纹和弧线条纹, 该型钵和水波纹多见于林家遗址晚期偏早阶段。^[10] 标本 T10④:37, 深腹罐, 侈口, 卷沿, 方唇, 唇面压印斜向绳纹, 腹部饰交错绳纹, 颈部和腹部饰 4 道箍带纹 (附加堆纹)。标本 H3:16, 卷沿, 绳纹花边口, 肩部和腹部饰纵向绳纹, 与 B 组的 CH 罐接近, 但颈部均为素面, 绝不见任何纹饰, 多见于林家遗址等马家窑类型。

B 组陶器除延续第 I 段的 A、B、C 三型罐外, 出现了一些新器形, 如直口立领罐 (D 型)、侈口直腹罐 (E 型)、侈口深腹缸等。标本 T12④:21, A II 式罐, 直口, 短颈, 平折沿, 方唇。标本 H3:36, B II 式罐, 侈口, 方唇, 唇面压印斜向绳纹, 颈部和腹部饰交错绳纹, 肩部贴塑 4 个一组的圆形泥饼。标本 H8:42 和 H8:64, C II 罐, 侈口, 卷沿, 圆唇, 唇面压印斜向绳纹, 颈部饰斜向绳纹, 腹部饰交错绳纹。标本 H8:73, D 型罐, 直口, 方唇, 立领, 广肩, 唇面压印斜向绳纹, 颈部和腹部饰分段纵向绳纹, 该种罐见于茂县波西遗址 (T1④:1)。标本 H3:5, E I 式罐, 侈口, 折沿, 方唇, 唇面压印绳纹, 沿下饰箍带纹一道, 直腹略鼓, 器表饰纵向和斜向绳纹。标本 H8:36, A 型缸, 直口, 折沿, 方唇, 唇面压印横向绳纹, 器表饰纵向绳纹, 直腹略鼓, 外形与 EI 式罐较近, 但体形较后者大。

第 III 段, 包括 H1、H18、H19、H21、H24、T1③、T8③和 T13③等地层单位, 大致与原报告晚期晚段对应。该段 A 组文化因素较第 2 段大量减少, 而 B 组文化因素则有所增强, 出现一些新器型和新的纹饰, 如出现较多圈足器和瓦棱纹。

A 组陶器方面, 仅见少量壶、彩陶盆、彩陶钵和带嘴锅等。标本 H17:26, A III 式壶, 侈口, 折沿, 圆唇, 颈部下端内收略呈束颈。标本 H18:11, 彩陶盆, 敛口, 折沿, 方唇, 沿面彩绘竖线条纹和弧线条纹; 标本 H24:30, 彩陶钵, 直

口, 折沿, 上腹外表绘制水波纹和草叶纹, 内饰黑彩弧线条纹; 标本 T14③:11, 彩陶钵, 直口, 折沿, 下腹内收, 沿面彩绘竖线条纹和弧线条纹, 腹部饰水波纹和弧线条纹, 彩陶盆和彩陶钵的彩绘风格与林家遗址第 3 层 (T5③:8) 的风格一致。

B 组器物除了继承第 II 段的外, 出现较多的圈足器。标本 T8③:27, B III 式罐, 直口, 方唇, 唇面压印斜向绳纹, 颈部和腹部饰交错绳纹, 肩部贴塑 4 个一组的圆形泥饼。标本 H18:1, C III 式罐, 与 C II 基本一致, 仅颈部加饰附加堆纹一周。标本 T1④:30 矮圈足器, 表面饰多道戳印纹; 标本 H19:1, 矮圈足器, 器表饰纵向绳纹, 足根部饰斜向绳纹; 标本 H21:9, 高圈足, 圈足内底凸起并饰篮纹, 外表饰斜向绳纹。标本 H1:5, 形制与 C III 式罐基本一致, 但为泥质陶, 腹部饰瓦棱纹。

综上, 我们认为营盘山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 3 段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 其中第 I 段的时代与大李家坪三期中段遗存年代相当, 第 II 段和 III 段分别与林家遗址晚期早段和晚段年代相当, 即与大李家坪第三期晚段遗存的年代相当。营盘山遗址 2000 年试掘时曾采集木炭标本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加速器质谱实验室进行测试, 有 2 个碳—14 年代测试数据, BA03280 (2000SMYT10H8): 4390 ± 60 a B. P.; BA03281 (2000T12⑥): 4170 ± 60 a B. P。2003 年发掘采集的木炭标本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测出了 3 个碳—14 测年数据: 4416 ± 31 , 4274 ± 31 , 4419 ± 32 a B. P, 经树轮校正后大体为 4881 - 3100 a B. P,^[11] 树轮校正后的年代范围约为距今 5300 ~ 4600 年。林家遗址有 3 个晚期早段 (简报分期) 标本的碳—14 测年数据, 其中 H19 的木炭和 F21 的炭化稷粒为距今约 4700 年, F20 的炭化木柱为距今 5200 年,^[12] 学术界一般采用 4700 a B. P 作为林家遗址的年代下限。结合两个遗址的碳—14 测年数据, 我们可将营盘山遗址的年代的下限定在 4700 a B. P 左右, 至于营盘山遗址的上限当与大李家坪三期中段遗存年代相当, 估计在 5000 a B. P 左右。

	A组陶器 (马家窑类型文化因素)				B组陶器 (本土文化因素)			
第 I 段								
第 II 段								
第 III 段								

图六 营盘山遗址陶器分期图

（二）文化属性探讨

前面已经提到对于营盘山遗存的文化属性目前有着几种不同的认识。无疑，学者们都注意到马家窑类型文化因素的影响力，而且主要是从陶器群方面进行分析的。虽然石制品和骨器的分析不如陶系分析那么直接反映文化谱系之间的关系，但还是有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增强说服力。为全面地考察营盘山遗址的文化属性，我们先对前面学者关注较少的营盘山遗址出土的石器和骨器进行梳理。

营盘山出土的石制品包括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者包括刀、斧、杵、石球（弹丸）、穿孔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和雕刻器等；磨制者包括斧、锛、刀、长方形穿孔石刀、凿、砺石、石环等。

营盘山长方形穿孔石刀分长方形单孔石刀和长方型双孔石刀，这两种形制的系绳石刀在甘青地区有较多发现。而在白龙江流域多为两侧带缺口的系绳石刀，在武都县大李家坪公布的材料中，二、三期均不见穿孔系绳石刀，陶刀也是两侧带缺口的，不见穿孔的。^[13]而在营盘山遗址新石器时代的地层单位还不见两侧打缺系绳石刀，也不见陶制的穿孔系绳刀，在距营盘山遗址不远的波西遗址早段也不见两侧打缺系绳石刀。

营盘山遗址出土较多的细石器，原料以燧石和水晶为主，有细石核、细石叶等；^[14]而在甘青地区的白龙江流域中极少见，师赵村五期仅发现细石叶 1 件，^[15]在东乡林家有较多发现，原料主要为玛瑙、水晶和石英等。^[16]

环形器，在大李家坪二期和三期、师赵村均有发现，其中东乡林家发现石环较多，系先将石料打成扁平圆状，由二面中部琢击成孔，再用石钻从二面钻磨圆孔，有骨、陶、石质三种。营盘山的环形器看来也并非受白龙江流域文化的影响，而与洮河流域和大夏河流域的马家窑类型文化有联系。而在四川盆地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广元中子铺不见这类器物。

石球，在大李家坪二期不见，但三期出现少量，而在东乡林家遗址有大量发现，师赵村也有较多发现。石杵在东乡林家遗址、大李家坪遗址也有发现，在师赵村第五期不见，在广元中子铺不见石杵。石斧，营盘山有打制和磨制两种，均

为弧刃中锋，平面呈梯形或长方形。在东乡林家遗址、大李家坪师赵村五期、广元中子铺均有出土。石锛，营盘山、东乡林家、师赵村五期均有出土。同样，在甘青地区比较常见的石镞在营盘山也少有发现。^[17]

从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营盘山遗址出现的系绳石刀、环形器、石球、石杵、细石器、弹丸等无疑是受到了来自甘青地区马家窑类型文化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来自甘南林家遗址的影响。虽然在嘉陵江上游的广元中子铺较早就出现了典型的丰富细石器遗存，年代为距今 7000 ~ 6000 年，^[18]与营盘山遗址的时代有较大的差距；而且营盘山遗址其他种类的石器多不见于该遗址，很难说其细石器传统来自于中子铺遗址的影响。另外，营盘山遗址出土的穿孔石片、石网坠和涂红石块则为甘青地区同时期的文化所不见，虽然数量较少，不占主流，但说明营盘山遗址的居民在生计模式（渔业）和信仰方面（尚红）与甘青地区比较也有自己的特点。

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骨器种类有锥、簪、镞、（骨）梗刀、磨光肋骨等，另有一些制作骨器的坯料和废料，对于全面复原制作骨、角器的工艺流程有重要意义。这些工具主要用鹿角、鹿和牛的肋骨、长骨作为原料，经过截料、制坯、琢磨、挖槽、钻孔、雕刻纹饰等工序制成，另有少量有染色。^[19]不论从加工骨器的原料、制作方法，还是骨器种类，营盘山遗址在骨器方面均与林家遗址的骨器特征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甚至像骨梗刀在营盘山也同样有少量出土。

陶器方面，第Ⅰ段时期，A、B 两组文化因素发展较均衡，从器形方面来看，A 组的彩陶瓶、壶、钵均为甘青地区马家窑类型的典型器物。B 组以罐类为主，其中 CI 壶颈部装饰弦纹的风格显然不同于马家窑类型，也不见于仰韶晚期，更可能是文化交融的地方特色现象；另外，A、B、C 三型罐不见于甘青地区，而是本土文化因素。第Ⅱ段时期，A 组文化因素除了继承第Ⅰ段的彩陶瓶、壶、钵外，彩陶盆、带嘴锅、器盖、深腹罐、碗等马家窑类型的常见器物也相继出现。B 组器物依然以各种罐为主，新出现了 D、E 型罐，以绳纹、箍带纹和弦纹为组合的复

合纹饰广为流行。第Ⅲ段时期，A 组文化因素逐渐消减，器类仅剩壶、彩陶盆、彩陶钵和带嘴锅，而 B 组文化因素除继承前段的外，圈足器的流行和瓦棱纹的出现成为全新的文化因素，与河湟地区的马家窑类型和大李家坪第三期晚段有着较大的差异。陶器中的 A 组无疑是来自于马家窑类型的文化因素，而对于 B 组文化因素的认识则是我们探讨营盘山遗址文化属性的关键。就目前的发现情况来看，这些文化因素多见于岷江上游地区，至于它是马家窑类型发展到川西北地区适应当地环境而产生的，还是岷江上游本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素？目前仅有波西遗址早段比营盘山遗址早，且波西遗址 G1 并不见营盘山 B 组文化因素^[20]，因此要做出判断还有待于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发现的不断积累。而 C 型壶为对 A 型壶的本地化模仿，在颈部装饰弦纹目前仅见于营盘山遗址；B 组的 C 型罐与 A 组的罐形态也非常接近（H3:16），仅在颈部装饰密集的绳纹和附加堆纹，这应该是对马家窑类型陶器的模仿，也加入了本地的文化因素。

通过对营盘山遗址出土的石器、骨器和陶器的观察以及与周边文化的对比，鉴于对 B 组文化因素的研究状况，我们认为将营盘山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归属于马家窑类型发展到岷江上游地区的一个地方类型是比较恰当的，其上限与大李家坪三期中段遗存年代相当，下限与林家遗址晚期晚段、大李家坪第三期晚段遗存的年代相当。当然，营盘山遗址的彩陶比例较低（5% 左右），存在一定比例的磨光黑皮陶，盛行绳纹、锯齿状花边口沿，箍带纹、绳纹、弦纹等组成的复合纹饰也非常有特点，晚段流行矮圈足器和出现瓦棱纹等均与河湟地区的马家窑类型有较大的差异；而彩陶比例低，盛行绳纹、锯齿状花边口沿，箍带纹、绳纹、弦纹等组成的复合纹饰恰也是大李家坪遗址第三期的一大特点，这似可暂将其理解为马家窑类型边缘化的特征。另外，与营盘山遗址隔河相望的沙乌都遗址，出土陶器不见营盘山遗址的彩陶和细泥红褐陶等，大量文化因素与岷江下游的宝墩文化相似，发掘者将之命名为“沙乌都遗存”，年代距今 4500 年左右；并认为在夹砂褐陶及泥质灰陶系方面、装饰绳纹及纹

唇风格等方面也延续发展了营盘山遗存的文化因素，更多地表现出浓郁的本地文化特色。^[21]笔者认为其继承了营盘山第Ⅲ段大量的文化因素，如侈口罐（H1:2）与 D 型罐相似，仅唇部由方唇变为尖圆唇；瓦棱纹也较常见，不仅继承了营盘山第Ⅲ段较窄的瓦棱纹（H1:7），还出现了较宽的瓦棱纹（H1:18、H1:13）；喇叭口壶形器也当是有营盘山遗址常见的壶发展而来；绳纹和锯齿状花边也被沙乌都遗存继承。而这些文化因素又均较多的出现在宝墩文化中，故有的学者认为宝墩文化与营盘山遗址有相当密切的关系。^[22]

目前，岷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逐步建立，就现有的材料看，三个明显的阶段是清晰的。^[23]营盘山遗址发现的重要性不但在于充实了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也反映在将岷江、白龙江、大渡河、嘉陵江以及大临河五条水系的文化联系起来。关于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川北、川西的关系，张强禄先生曾做过有益的探讨，其主要从地理环境、传播途径、生产经济类型等方面展开的。^[24]陈卫东和王天佑先生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探讨，强调了气候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认为公元前 3000 年的降温活动是文化南迁的一个重要原因。^[25]但是，波西遗址庙底沟遗存的发现说明文化的南迁在马家窑类型之前就已经发生；而且在白龙江流域的大李家坪遗址并没有典型的庙底沟类型的文化遗存，这一文化因素更可能是从陇西地区南下的，也表明营盘山遗址的马家窑类型文化因素不仅仅是受白龙江流域的影响，更要注意陇西地区的马家窑类型文化因素，我们对营盘山出土石器和骨器的分析更提醒了应该关注这一文化传播途径。

注释：

[1]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 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

[2] 张忠培等《关于马家窑文化的几个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

[3] 丁见祥《马家窑文化的分期、类型、来源及其与周边文化关系》，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

[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 2000》，科学出版社，2000 年。

内敛型的录簋都是穆王时器，不过前者出现早，后者要晚些，而且内敛型凤鸟形簋耳不见于穆王以后铜器。第三期则以本文所论晋侯簋为代表，时间在共懿时期。由于有年代比较明确的而且前后相互连接的晋侯墓群作依托，以上结论便有一定的可靠性。而这对于西周中期青铜器的断代也将产生积极意义。

由于晋侯墓地 M7 被盗严重，其他晋侯墓的部分青铜器尚未修复，资料也未完全公布，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困难。本文的论说难免有不周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附记：在本文写作中，承蒙徐天进教授提供晋侯墓地相关信息，谨表谢忱。

注释：

[1] 王世民等 《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 年。

[2] 唐兰 《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 336、329 页，中华书局，1986 年。

[3] 张懋镠、王勇 《仲虺父簋赏析》，《上海文博论丛》2008 年第 4 期。

[4] 张懋镠、王宏 《芮公簋盖识小——兼论垂冠大鸟纹》，《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0 年。

[5] 李伯谦 《晋侯墓地墓主推定之再思》，《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6] 李学勤 《谈叔父方鼎及其他》，《文物》2001 年第 10 期。

[7] 上海博物馆编 《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年。

(上接第 39 页)

[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四川汶川县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四川文物》2004 年增刊。

[6] 蒋成、陈剑 《岷江上游考古新发现述析》，《中华文化论坛》2001 年第 3 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 2000》，科学出版社，2002 年；蒋成、陈剑 《2002 年岷江上游考古的收获与探索》，《中华文化论坛》2003 年第 4 期。

[7] 江章华 《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新发现的几点思考》，《四川文物》2004 年第 3 期。

[8] 陈卫东、王天佑 《浅议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四川文物》2004 年第 3 期。

[9] 同 [3]。

[10] 林家遗址报告将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但笔者认为晚期尚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林家遗址第 3 层下的遗迹单位，后段为第 3 层。

[11] 资料现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 《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考古》2005 年第 7 期。

[12] 同 [1]。

[13] 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武都县李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 13》，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年。

[14] 蒋成、陈剑 《2002 年岷江上游考古的收获与探索》，《中华文化论坛》2003 年第 4 期。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

[16] 同 [1]。

[17] 同 [1]、[13]、[15]。

[18] 王仁湘、叶茂林 《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 年。

[19] 何锟宇 《营盘山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

[20]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四川茂县波西遗址 2002 年的试掘》，《成都考古发现 2004》，科学出版社，2006 年。

[21]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四川茂县沙乌都遗址调查简报》，《成都考古发现 2004》，科学出版社，2006 年。

[22] 同 [7]。

[23] 陈剑 《波西、营盘山及沙乌都——浅析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演变的阶段性》，《考古与文物》2007 年第 5 期。

[24] 张强禄 《试论白龙江流域新石器文化与川西、川北新石器文化的关系》，《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 年。

[25] 同 [8]。